

儒教在

当代韩国的命运

周月琴／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儒教在 当代韩国的 命运

周月琴／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教在当代韩国的命运/周月琴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30 - 2443 - 3

I. ①儒… II. ①周… III. ①儒家—研究—韩国—现代 IV. ①B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5420 号

内容提要

当代韩国正在批判与消解儒教传统、儒教社会体制及价值观, 当代中国则正在试图复兴包括王道政治、儒教教育、宗教性儒教等在内的儒教传统。这是一个对比鲜明的东亚儒教文化现象。另一个与儒教有关的东亚文化现象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伴随东亚经济的发展、危机而呈现出的对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与意义的赞扬及批判。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对儒教的批判或复兴, 都表明东亚的儒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始终是近代以来东亚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现象。同时, 无论是中国近代对儒教的批判、现代东亚对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的肯定以及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 还是当代韩国的儒教体制消解与价值观抛弃, 始终未能从哲学上解决“儒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根本问题。本书首次从哲学比较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 对这一核心问题进行尝试分析与探索。

责任编辑: 冯 彤

责任出版: 刘译文



儒教在当代韩国的命运

RUJIAO ZAI DANGDAI HANGUO DE MINGYUN

周月琴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386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29mm 1/16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387 千字

ISBN 978 - 7 - 5130 - 2443 - 3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8

责编邮箱: fengtong@cnipr.com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19.25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儒教在当代中韩两国的不同命运及其意义^❶

当代韩国正在批判和抛弃自己的儒教传统。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金大中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儒教资本主义模式的现实批判，还是继任的卢武铉政府以取消户主制为契机在法律层面上对儒教传统社会体制的消解，以及韩国学者在主体史观下以“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为题对儒教价值观的彻底批判，都意味着儒教在当代韩国正在经历着被批判与抛弃的现实命运。

作为儒教思想与文化发源地与宗主国的当代中国，却在经历了近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教的彻底批判与抛弃，以及现代的“文革”对儒教价值观的彻底痛击以后，在最近 30 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正在试图恢复自己的儒教传统。无论是大陆新儒家在儒教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乃至宗教意义上的尝试复兴，还是半官方性质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主要大学的建立，都意味着儒教在当代中国正在复兴。

儒教在当代中韩两国正在经历着截然相反的现实命运。这与亚洲“四小龙”时代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共同肯定儒教伦理对东亚经济飞速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形成鲜明对比。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几乎同时进入了新兴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行列，这一巨大的经济现象很快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关注。研究者发现，这一地区最为显著的现象是亚洲“四小龙”在文化上同属儒教文化圈，再加上此前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日本在文化特质上同样属于儒教文化，从而使得东亚的儒教传统重新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韩国和日本学者也开始对自己的经济发展与儒教文化传统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日本学者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1982）与韩国经济学家金日坤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1984），成为这一时期研究东亚经济与其儒教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论著。儒教伦理的忠孝、团结、勤俭、教育以及集体主义精神等，被认为对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功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其经济意义被一再肯定和宣扬，儒教的中央集权传统也被认为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贫穷落后的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和地区成为新兴发达国家的关键因

❶ 本书为 2002 年度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批准号为：教人司 [2002] 350 号。

素。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新加坡，更是在总理李光耀对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与意义的肯定下，提出了与西方价值相抗衡的亚洲价值，儒教资本主义成为被东西方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肯定的东亚经济发展的“亚洲模式”与“东亚奇迹”的经济文化阐释。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同样成为一个重要的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突然发现，深受中国儒教文化影响且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近邻韩国，已经在经济上实现了现代化，跨入了新兴发达国家的行列。这让开始全力追求经济发展的中国大陆感到羡慕并产生研究的兴趣，由此引发了中国大陆的儒学热。出于同种原因，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和华人占总人口79%的新加坡，也被拿来作为分析儒教伦理对东亚经济发展作用的样本。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1983）则是这一时期当代新儒家最为重要的儒教伦理价值著述。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儒教传统展开的经济学与哲学批判及随之而来的体制性消解不同，中国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始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致力于儒学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对儒学的研究持续升温，对港台新儒家的研究成为引发当代中国儒教复兴的思想源泉。1995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大会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大陆的儒学热已经开始被官方重视。

在经历了“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长期理论论争之后，终于在2004年进入了儒教复兴的文化诉求期，以蒋庆、康晓光、陈明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一开始便在思想上提出了复兴儒教政治、立儒教为国教等政治诉求。由蒋庆编纂出版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及由此引发的少儿读经热、国学热、汉服热等，成为当代中国大陆最为显著的文化现象。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年。

因此，值得思考的是，同样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现代中国为何不仅没有像韩国那样批判与抛弃儒教传统，反而加深了对自己的儒教传统文化的复兴诉求呢？在长期对儒教文化与东亚经济关系的关注与研究中，笔者注意到，韩国与中国存在着历史与现实上的时间与空间差异。

时间上的差异是，中国在近代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教社会体制的彻底批判与抛弃。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打倒孔家店，全盘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成为胡适、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痛批“吃人的礼教”，唤醒国民麻木心灵的国家生存之路的时代选择，但也因此留下了“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思想史难题。对于坚持“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批判与抛弃儒学便是抛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担忧，不仅形成了当代新儒家这样一个思想流派，而且也是渊源于当代新儒家的大陆新儒家呼吁复兴儒教的根源与理由。更多的大陆学者与公众同样有复兴儒学的思想要求，

除了对“儒学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认同外，更强烈的现实需要则是迫切希望能够用儒家的道德优势解决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之后因道德缺失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与中国近代对儒教体制的彻底批判与抛弃相比，韩国则因为在近代直接被日本吞并，并在长达35年的沦为日本殖民地这一特定历史现实而失去了批判与消解传统儒教体制的历史契机。日本在殖民侵略时期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对韩国进行了残酷掠夺与压制，甚至强迫韩国人放弃自己的姓氏和民族语言，改用日本姓氏，学习日语，试图从文化上彻底奴化朝鲜半岛，则是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更加强烈地要求恢复近代以前的儒教传统的直接原因。

光复后建立的韩国，不仅在民法上保留了如户主制所代表的家父长制、同姓不婚、子女必须随父姓、只能收养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族等大量儒教传统习惯法，而且在冠、婚、丧、祭等礼仪制度上保留了儒教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忠孝仁义等儒教的价值观。再加上现代韩国在经济起飞上的儒教伦理色彩被广泛宣扬，以及韩剧在中国的流行，儒教韩国几乎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共同感受。

当代韩国对儒教传统的批判与抛弃则是由空间原因导致的。韩国自1945年光复时起，就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接受了美国的影响。韩国经济学家金日坤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接受了新的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并沿用至今。它们逐渐远离了儒教森严的上下尊卑秩序。但是，在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系统中，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更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向往美好生活是人类的天性。”^①但也正是因为东亚的儒教传统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民主主义的社会体制的结合中，始终存在诸如专制与民主、等级与平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亲情与法治等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对立，导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开始批判与抛弃自己的儒教传统，转而采取全盘西化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模式。

对于典型的儒教国家韩国而言，一方面在民族主义的情感需求中恢复了自己的儒教传统，另一方面却又在空间上接受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儒教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使韩国从传统的农本主义中摆脱出来，在朴正熙军事独裁政府的中央集权政治主导下，建立了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结构，最终使韩国由原来的农业国家成功跨入了新兴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与此同时，一旦经济上实现了现代化，生活在儒教社会体制中的人们很快便感受到了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背后的民主、平等、个人自由等思想价值要求，与儒教的集权政治、社会等级制度、家父长制等传统之间的现实冲突。经济的发达带来思想上的进步要求，这种要求在亚洲“四小龙”

① [韩]金日坤著，邢东田等译：《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第1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时代被经济的繁荣所掩盖和遮蔽，但始终在民间形成进步知识分子与妇女联合会为代表的废除户主制的强烈要求，并终于借助 1997 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出来，最终成为当代韩国在法律层面上对儒教传统进行体制性消解与儒教价值观抛弃的内在动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代韩国在批判和抛弃儒教传统的过程中，在哲学上将中国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教社会体制的批判与抛弃作为思想依据，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交织。反映出来源于中国的儒教文化在韩半岛传播中的另一种时空现象，即从时间上看，作为儒教文化发源地的中国在儒教的起源、发展与文化传播中，总是要比文化接受地的朝鲜半岛先进。根据韩国学者李泰镇的研究，这种时间上的先进在历史上表现为中国在儒教文化上总是要比朝鲜半岛先进 300 年。这是在近代以前的农耕时代。而我们今天观察到的现代中韩两国对儒教的批判、肯定、再批判、再肯定的横向文化对比上，中国大陆仍然要比韩国先进百余年。这也是为什么儒教在当代中韩两国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现实命运的原因之一。

当然，时空上的交错并不是最根本的。对于具有相同特质的儒教传统文化的中韩两国而言，儒教传统文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影响与意义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其次则是困扰了近代以来中国大陆百余年的“儒教与传统文化”这个根本难题的民族文化意义；然后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关注的道德重建问题。当扶不扶摔倒的老人几乎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面对和思考、抉择的现实道德与法律问题，对社会道德失落的思想困惑与两千年儒教传统所显示的道德优势，也是促使大陆新儒家呼吁复兴儒教传统的根本原因。而对于正在批判和抛弃儒教传统的当代韩国而言，儒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同样成为其民族精神意义上的思想困惑，这也是当代韩国作为宗教组织的儒道会及 1000 万儒林维护儒教传统文化、抗衡时代批判的根源。

总之，无论是当代韩国正在进行的儒教批判与抛弃，还是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复兴儒教的尝试与努力，在看似相反的儒教命运中，却纠缠着一个相同的哲学问题，即如果儒教曾经是中国和韩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它又为什么会在近代中国和当代韩国一再遭到体制性消解与哲学上的批判与价值观上的抛弃？由此产生的哲学问题是，既然儒教传统体制在近代中国与当代韩国已经或正在经历体制性消解与价值观抛弃，中韩两国社会又为什么始终无法走出儒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近代百余年来始终纠结在“批判与抛弃自己的儒教传统就意味着批判与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困惑中无法自拔？同时，“儒学（教）就是中国（韩国）的传统文化”这个哲学问题中包含的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民族情绪。它在当代韩国包含的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冲突，在当代中国包含的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哲学意识形态的模糊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失落与社会失序问题与悠久的儒家道德传统资源之间的内在整合问题。换言之，东亚的儒教传统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我们

这个时代关注儒教传统的根本动因。

比较是为了能够更清楚地分析。因此，无论是从儒教在中韩两国所具有的同质性文化特征（即同属以朱子学为哲学形态的宗教性礼教）来看，还是从儒教在近代以来在中韩两国所经受的被批判、肯定与再批判、再肯定的错时空文化现象都与各自国家在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上讲，对儒教在当代韩国命运的文化观察与哲学分析，都将有可能为当代中国正在尝试复兴的儒教提供思想上的对比与借鉴意义。

目 录

导论 儒教在当代韩国的命运：研究的意义	1
一、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1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4
三、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界定	11
四、研究方法及基本内容	13
 第一章 “儒教资本主义”：东亚“四小龙”时代的儒教价值研究	16
第一节 “汉江奇迹”：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与意义	16
第二节 “亚洲价值”：新加坡的儒学运动与儒教伦理价值倡导	25
第三节 韩国模式：“儒教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陆的意义	28
 第二章 “裙带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时代韩国的儒教批判	40
第一节 金融危机后韩国儒教社会对西方的文化心理对抗	41
第二节 金大中政府的经济改革对儒教社会的现实冲击	44
第三节 金融危机后韩国对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与哲学批判	50
 第三章 废除户主制：卢武铉时代对儒教社会体制的消解	64
第一节 户主制的历史演变及现行户主制的法律内容与问题	66
第二节 废除户主制：法律制度上对儒教体制的消解	75
第三节 废除户主制的儒教体制消解意义：卢武铉的成与败	80
 第四章 取消祭祀：基督教对儒教价值观的消解	88
第一节 取消祭祀：基督教在传入中国后与儒教的冲突	89
第二节 “礼仪之争”：近代韩国因祭祀问题对基督教的血洗	103
第三节 放弃祭祀祖先：韩国基督教在价值观上对儒教的消解	114

第五章 明代性理学：当代韩国儒教社会体制的历史渊源	121
第一节 明代性理学：礼教中国与礼教文明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122
第二节 《大明会典》与《经国大典》：朝鲜礼教社会体制的确立	127
第三节 《文公家礼》与《乡约》：朝鲜礼教社会体制的完成	132
第六章 儒道会：当代韩国的儒教社会体制剖析	151
第一节 儒道会：当代韩国的宗教性儒教组织	151
第二节 儒道会的儒教教育实践活动	159
第三节 婚丧祭祀之礼：当代韩国的儒教社会生活方式	167
第四节 户主制与刑法：当代韩国法律层面上的儒教社会体制	173
第五节 “先辈”与“后辈”：儒教社会等级制度与价值观解析	179
第七章 弹劾总统：儒教势力的反击与思想坚守	186
第一节 弹劾总统：儒教势力在现实中的抗争与思想上的坚守	186
第二节 金融危机后儒教社会对儒教文化的论争与维护	190
第三节 儒教学界的思想反省与时代探索	205
第八章 儒教在当代中韩两国的不同命运及意义	213
第一节 当代中国：正在恢复的儒教传统及其问题	214
第二节 儒教在当代中韩两国的不同命运：比较的意义	236
第三节 价值观：中韩传统文化出路问题探讨	252
第四节 例证：日本为什么成功？	276
结论与思考：价值观才是中国乃至东亚传统文化的核心	284
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	288
后 记	295

导论 儒教在当代韩国的命运：研究的意义

“当儒教最终成为历史时，这是因为历史已经超越了儒教。固有的古典学问，亦即源自经典所记录的有关抽象的人如何创造永恒历史的那种实践不起作用了。外来的古典学问——亦即关于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在一个注定的历史过程的某一阶段中创造历史的语言——进来了。这也是新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要求建立的学问，顾主张‘清理中国的古代作品’，以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重新评价历史遗产’这一反儒家的号召。儒教变成了理性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理性研究的条件）而没有成为情感联系的对象，成为一块引起人们对过去之虔诚的历史纪念碑。正是在与近代西方工业世界的遭遇中，这些中国人既相当于干净地清除了儒教这个儒家的必然之物，又实际上被确认为传统主义者，但是一些具有非传统品质的传统主义者。”^①

——[美]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一、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1968年，当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带着泣血般虔诚的情感，以博物馆和历史纪念碑来比喻儒教在近代中国被批判与抛弃的现实命运，再加上其思想前辈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中对儒教传统无法开出资本主义的断言，儒教在现代中国被抛弃的命运几乎成为公认的思想定论。而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对儒教传统思想与价值的彻底批判与否定，甚至在“破四旧”名义下对任何带有儒教文化色彩的历史纪念物的彻底摧毁，似乎正是对列文森的儒教在现代中国没落命运的现实回应。

没有人能料到，儒教会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回到东西方共同的关注中。当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使近代以来始终处于贫穷落后和被侵略状态中的儒教文化圈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了经济上的现代化以后，对其儒教文化传统的研究与经济学意义上的

^① [美] 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359、3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价值肯定，使东亚的“儒教资本主义”模式成为东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关注的重点，并对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形成巨大吸引力。

但是，当正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大陆全力分析与肯定“韩国模式”并试图学习东亚的“儒教资本主义”模式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打碎了这种幻想，也导致了韩国对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的批判与否定。

遭受严重金融危机的韩国，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助的同时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不仅从经济学上批判与否定了儒教传统的伦理价值，将原来的“儒教资本主义”模式改为“裙带资本主义”大加批判，在哲学上也直接提出了“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的口号，并对儒教伦理的孝道、家族主义等进行了彻底批判；在政治上则是以金大中、卢武铉等国家领导人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主导的民主化运动为特征，全面推行西方的民主、平等、法制、人权、自由与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彻底否定了韩国的儒教传统；在法律上则以卢武铉时代的废除户主制为代表，展开了对传统儒教社会体制的全面消解。儒教在当代韩国正面临着被彻底批判与抛弃的现实命运。西方学者也不再关注东亚的儒教文化。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大陆在分析、批判“韩国模式”的同时，也对20世纪80年代的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与意义进行了重新观察与研究。但令人惊奇的是，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大陆却在2004年进入了复兴儒教的文化保守主义年。大陆新儒家不仅要求复兴传统的儒教伦理，而且直接要求复兴儒教的王道政治，要求依靠国家行政权力将儒教重新变为国家宗教或公民宗教。众多的儒教网站、儒教学术期刊如《原道》的诞生，以及少儿读经热、汉服热的兴起，深圳孔圣堂等宗教性儒教组织的出现，都意味着当代中国正在复兴自己的儒教传统。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则是儒教复兴的一个文化象征。

总之，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角度看儒教在近代中国的没落、在现代东亚的复兴与衰落，还是从横向的空间角度看儒教在当代中韩两国相反的现实命运，都首先意味着儒教与东亚经济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巨大文化现象。儒教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内在紧张与矛盾关系，既不会因为东亚的经济发展而完全同化，也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出现而完全失去作用。儒教在东亚尤其是中国和韩国两千年的传统，仍将在长时期内对其经济发展的方式与走向起着内在的思想影响。

其次则是儒教与中韩两国的社会发展同样存在着无法回避的思想与现实纠葛。其中最为核心的纠葛是儒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所隐含着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精神与心灵困惑，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伦理道德失范所引发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中韩两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成败问题。

最后则是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所带来的东亚儒教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牵涉到近代西方侵略与殖民亚洲背景下的西学东渐导致的“中体西用”

(中)、“东道西器”(韩)这一哲学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由此产生的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心态也始终存在。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冷战结束后,这种文化上的对立很快上升为当今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将儒教文明定义为当今世界七大文明或文化形态之一,并不是要肯定其文化的积极性,而是要在政治学意义上引导出“中国威胁论”。西方在这一意识形态下以人权名义对中国的经济贸易限制与制裁,也是促使当代中国复兴儒教的内在原因。

与西方相比,中韩两国始终未能解决儒教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并因此导致近代百余年来对儒教的不断批判、肯定、再批判、再肯定的历史循环。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与危机,儒教也成了任人解释的文化样本。当代中国大陆出现的复兴儒教思潮,实际上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传统文化反映,而不是对儒教传统的真正理性解读。大陆新儒家在呼吁复兴儒教时表现出要求恢复早已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与抛弃的专制、等级观念等思想,正是中国大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延续东亚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儒教文化思想反映。这种有违历史常识的思想呼吁,也是导致中国大陆的儒教复兴在经历了最初两年的占据舆论焦点的辉煌后很快便陷入沉寂与社会文化无力之现状的根本原因。

本书之所以选择韩国而不是日本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现代日本的儒学与中韩两国的儒教并不是同质性的文化,而是经过日本文化改造了的儒学,而韩国儒教则与儒教文化宗主国的中国属于同质的礼教文化,在哲学上则同样渊源于朱子学(性理学)。

其次是当代韩国的儒教批判与抛弃运动,不仅在哲学上提出了近代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教批判的历史依据,也在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意义上重复着近代中国对儒教社会体制的消解过程,这对于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形成了直接的否定意义。如果不能合理地解释为何儒教在近代中国与当代韩国一再遭到体制性消解与思想批判的命运问题,想要真正复兴儒教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无论是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的道德重建需要的角度看,儒教都成为中韩两国无法超越的文化传统。尤其无法超越的是儒教与中韩两国的传统文化的历史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在“儒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批判与抛弃儒教就是批判与抛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一哲学观点下,当代中国与当代韩国无论是批判还是复兴儒教,都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形成民族精神的困惑。在这个意义上,儒教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在当代韩国的被批判,影响到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选择。

比较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尽管对儒教传统的研究在时间上涉及近代、现代和当代,在空间上则涉及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代中国在借鉴与模仿、批判“韩国模式”意义上的儒教复

兴问题所涉及的纷繁复杂的思想研究成果中,以当代中韩的儒教命运对比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能性与研究价值依然是一种理论尝试。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对当代中韩两国儒教命运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当代韩国的儒教命运的个案分析与研究,尚属最初的理论尝试,但其中所包含的重要的经济学、社会学意义与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如上所述,儒教的现代命运不仅因为与东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经历了“亚洲模式”(儒教资本主义)与“亚洲价值”的肯定阶段,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时代韩国对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与哲学批判,以及对传统儒教社会的体制性消解与宗教意义上的价值抛弃。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和中国形成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

西方学者对“亚洲奇迹”的关注与研究,经历了前后相反的观点变换;而中国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则集中在对“韩国模式”的经济学意义上,也同样经历了先肯定后否定的发展过程。不同的是,当代西方学者已经不再关注儒教伦理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韩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儒教传统的批判与抛弃的现实命运。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虽然已经很少再关注韩国模式与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与文化动力问题,但当代中国的大陆新儒家学者却在强烈呼吁复兴儒教,并因此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

(一) 东亚“四小龙”时代的儒教伦理价值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方学者首先开始对韦伯和列文森及其老师费正清的儒教观点进行了质疑与批评。保尔·科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①(1995),成为这种批判的代表作。

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学者从东亚的儒教文化传统上解读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如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霍尔曼·卡恩(Kahn Herman)的《1979年及其后的世界经济发展》(1979)^②,对东亚的儒教思想特征进行了研究,他把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认为由于儒教比西方社会更强调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因此儒家文化在今天比西方文化更适合现代化的需要,并称日本与东亚“四小龙”是“新儒教国家”;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在《设计的奇迹》(1982)中,将日本与东亚儒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功模式归结为“儒教资本主义”;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提出了“两型现代化”(1983)理论,认为当今

^① 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颜世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Kahn Herma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9 and Beyond (M)*. London: CroomHelm, 1979.

世界上已经发展出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模式，即除了西方的现代化类型以外，东亚社会也已经发展出了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类型；澳大利亚学者 Reg Little 的《儒学的复兴——亚洲经济发展的源泉》（1991），则直接肯定了儒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意义；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C·戴约编著的《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1991），也描述了东亚经济现代化的儒教文化意义。世界银行出版的《东亚奇迹》（1993）与亚洲开发银行出版的《崛起的亚洲——变化与挑战》（1997），使“亚洲模式”成为对“东亚奇迹”的理论概括，并引导东亚学者以“儒教资本主义”作为对“亚洲模式”的文化理论阐释。在这一前提下，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儒教伦理价值研究，成为该时期东西方理论研究的中心。

与此同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与 20 世纪 80 年代成功跨入新兴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也开始关注与研究自己的经济模式与儒教传统之间的关系。日本学者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1982），与韩国经济学家金日坤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1984），成为这一时期描述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与意义的经典著作。

这也正是吸引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中国大陆最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对与中国具有同质性儒教传统的韩国经济模式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与文化学者研究与关注的重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南朝鲜经济》（1981）、金光锡等的《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因素》（1981）、张世和等的《战后南朝鲜经济》（1983）、贵贵春等的《南朝鲜企业集团》（1987）、高粱等的《崛起的秘密——东亚经济起飞的经验及其给我们的启示》（1987）、吴敬琏等的《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宁向东的《韩国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1993）、裴小革的《韩国经济》（1994）、孙鲁军等的《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1994）、张志超的《韩国市场经济体制：从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的转化》（1994）、张颖等的《韩国财阀比较研究》（1994）、韩国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编著的《韩国经济发展论》（上册，1995）、李柱锡的《韩国经济开发论》（1996）、陈龙山的《韩国经济发展论》（1997）等，均是对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注与研究专著。

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我们国家的道路》（1988）、韩国官员学者金正濂的《韩国经济腾飞的奥秘：“汉江奇迹”与朴正熙》（1993）、宋丙洛的《经济的崛起》（1994）、泰洪朝的《东洋方式：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假说》（1994）、赵淳的《韩国的经济发展》（1997），以及乔恩·沃伦诺夫的《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振兴》（1989）等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对韩国模式的关注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国营大企业改革正走入困境背景下的中国学者研究的重心。

而沈华松的《开明集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关于东亚经济行政体制》（1992）、张洪武的《儒教伦理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精神》（1996）、任放的《东亚的经

济成就与经济伦理》(1996)、马庆钰的《东亚经济发展:儒家文化的新时代》(1996)、张洪武的《儒教伦理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精神》(1996)、张丕让的《传统文化与当代经济伦理》(1996)、金强的《韩国的儒教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建构》(1996)、魏云的《儒家文化和台湾经济》(1996)、崔天模的《传统儒家文化对韩国经济成长的影响》(1997)、沈义燮的《韩中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与儒教思想》(1998)、赵一红的《论东亚发展的文化主体机制》(1998)、张学礼的《亚洲价值观及经济发展》(1998)、王建红的《儒教与新加坡经济现代化》(1999)、朱星焕的《儒教文化对韩国经济的影响》(2001)等研究论文,均在当时西方学者与韩国、日本学者的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研究及新加坡政府对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与意义的理论观点影响下,试图为当时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中国提供一个已经在东亚行之有效的“儒教资本主义”这一普遍发展模式。东亚的集权主义政府类型、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集体主义、忠孝等儒教伦理传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有关儒教资本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

作为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研究的样本,对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与儒教伦理的研究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中国学者首先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的儒教资本主义研究论著,如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1986)、山本七平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95),以及明治维新时期涩泽荣一提出的论语加算盘的日本资本主义模式,都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此后,中国学者开始出版自己的研究专著,如吴潜涛的《日本伦理思想与现代化》(1994)、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1995)、梁策的《日本之谜》(1986)、万峰的《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1984)、李公绰的《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1988)、张鸿翼的《儒家经济伦理》(1989)等专著,以及陈奉林的《儒教伦理与日本现代化》(1993)、袁方的《儒教伦理与日本资本主义》(1995)、周见的《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2003)等,为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现代化的日本与儒教伦理价值的思想关系研究的主要著述。美国学者弗兰克·吉布尼的《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1985)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北大教授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与尹保云的现代化与韩国模式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韩国与东亚模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借鉴意义的研究典型。

罗荣渠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自1990年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与现代化道路》开始,陆续出版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1992)、《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1993)、《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1997)、《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97),以及系列研究丛书《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93、2004、2009),对东亚现代化的模式与经验进行了探索与研究。1994年,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举办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东亚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同的发展模式及

可供借鉴的经验等，进行了深入的学术讨论，并出版了学术论文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1997）。罗荣渠在出版序言中阐明了召开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目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推动东亚现代化的综合研究而召开的”。表明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对东亚现代化成功模式的关注与借鉴意图。

尹保云的现代化研究则以对韩国为主要对象。他于1992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朴正熙政权的形成及其对南韩经济发展的影响》，1993年将博士论文修改为《韩国为什么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出版，1995年又对该书进行修改并出版了《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在此期间，还发表了系列论文如《集权官僚制的现代化道路——韩国发展经验探索》（1994）、《东亚的资本主义与文化——对韩国与台湾不同的企业结构的分析》（1995）、《结构调整与体制变革的关系——巴西与韩国的比较》（1997）、《经济现代化的真正内涵》（1997）等，在对韩国与中国台湾、巴西发展的相同与不同模式比较上，显示出对韩国现代化成功模式的关注与探究。

值得注意的是，尹保云的韩国模式研究从一开始就否认了儒教传统的现代化价值，认为儒教伦理是对宗法等级制度的解说和维护，是儒教社会向前迈进的巨大障碍。尹保云还同时批判了“东亚奇迹”背景下对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的两种对立观点，即一种认为儒学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另一种认为儒教有助于东亚工业化。尹保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二者都过分看重文化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制度层面的变化对文化因素作用之效果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于东亚尤其是韩国现代化成功的原因，尹保云更关注制度的作用而非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

因此，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尹保云很快发表了《韩国模式：金融危机的反思》（1998）、《伦理问题的复杂性——“文化战略”的理论反思》（1999）等，将研究的视角转到制度变革对韩国以及东亚现代化的意义上来，并先后出版了《什么是现代化》（2001）和《走出困境》（2005），探讨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同时发表了《“均富”观念对中韩现代化的影响》（1998）、《全球化与东亚发展》（2003）、《韩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2006）、《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选举》（2008）、《公民社会运动与韩国的民主发展》（2009）、《摆脱陷阱中的发展》（2011）、《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2012）等，显示出对政治制度影响韩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兴趣。

与尹保云的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观点相似，贾作林的《是“儒教文化”塑造了它们吗？》（1996）、启良的《日本“儒教资本主义”说驳议》（1996），也对东亚儒教传统的经济学价值与意义提出了反对观点。韩国学者黄炳泰的《儒学与现代性》（1995），对韩国儒学反现代化性格的哲学分析，虽与这一时期全世界对儒教伦理的经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肯定相反，但却与当时韩国政治上的民主化运动相呼应。

作为东亚“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则呈现出另一种研究氛围：以坚持中央集权统治的李光耀总理为代表的新加坡政府，在东亚“四小龙”时代背景下，于20世纪80